

從書寫到出版

——女書傳記的歷史意涵與當代困境**

劉 斐 玟*

摘 要

女書是流傳於中國湖南省江永縣的婦女專用文字，百年來，江永婦女便以女書作為結拜姊妹、致贈婚禮文書、抒發個人感懷、敘說他人生命經歷、祭祀祈願，乃至用以翻譯漢字民間唱本的工具。這些女書雖說文體有所不同，但其敘說主軸莫不環繞著「訴可憐」，或是訴說自身多舛的苦難經歷，或為他人代筆宣洩抑鬱。由於這些「訴可憐」帶有濃厚的傳記色彩，也因此成了重建農村婦女生命情境的重要史料；然，弔詭的是，女書傳記書寫的基調，在學者進入女書的文化場域後，發生了轉變。透過文本分析與書寫實踐的雙重視角，本文一方面說明女書的「訴可憐」如何呈現一般男性主流史料少見的婦女觀點；另一方面，則呈現出版對女書書寫實踐的形塑力，它在保留文化傳承之餘，也侷限了女書的書寫空間。

關鍵詞：女書、傳記、訴可憐、書寫、實踐、出版

一、前 言

女書是流傳在中國湖南省江永縣的一種婦女專用文字，一種只有女人能讀寫，而男子卻不能識讀的書寫系統。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 本文初稿原發表於「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國際研討會」。本論文之另一修訂版亦提交《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刊審查、發表。

百年來，這些大抵不識得漢字的農村婦女，便在江永這個男主外、女主內的小農父系社會中，以女書寫下她們的情意音聲。或以女書與他村的結拜姊妹信函往返，或以女書寫下她們對新娘的叮嚀祝福並敘離別依依之情，或以女書寫下對神明的祈求與願望。女書更是婦女宣洩苦情的工具，或傾訴自身多舛的命運，或為不能書寫女書的婦女代筆抒發抑鬱。當然，生命不會盡是苦情，所以在訴苦之餘，女書也有它的娛樂功能，那就是用來翻譯以漢字書寫而成的民間唱本，像是梁祝姻緣、鯉魚精等傳奇故事，這也使得女書所呈現的不僅是江永一方水土的人情故事，更是女書小傳統與漢字大傳統之間的文化連結。

女書究竟自何時起，又是在何種因緣下，成為婦女的專用文字？由於史料缺乏，眾說紛紜。主要爭論有二。第一，女書是否源自漢字？有學者認為女書的歷史不遜於甲骨文，或至少是古越文字的遺留；¹有的學者認為女書帶有楷書的影子，因此認為它不僅是漢字的分支，甚至遲至明清才發展而成。²第二，女書是否為婦女所創？有學者主張女書可能是在女紅圖案的基礎上孕育而成；³有的則認為女書乃瑤族為反抗漢人統治所發展出的神秘文字。⁴

女書之源莫衷一是，主因在於上述任一說法都欠缺強而有力的文物或史料佐證。目前關於女書最早的直接證據是一枚太平天國銅幣，上面刻有「天下婦女／姊妹一家」的女書字樣。然而，由於銅幣上的「婦」字從未見諸其

-
- 1 謝志民，〈女書之源不在楷書〉，《中南民族學院學報》48(1991): 98-106；謝志民，〈女書是一種與甲骨文有密切關係的商代古文字的決疑和演變〉，《中南民族學院學報》51(1991): 59-65、73；謝志民，〈女書詞彙中的百越語底層〉，《民族語文》2(1991): 62-70；李慶福，《永州女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李慶福，《女書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陳其光，〈女字與漢字〉，《漢學研究》11.2(1993.12): 251-258；陳其光，〈女字的產生和性質〉，收入史金波、白濱、趙麗明主編，《奇特的女書——全國女書學術考察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頁113-124；宮哲兵，〈江永女書是清代的文字〉，《尋根》2(2001.4): 19-25；趙麗明，〈漢字在傳播中的變異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1(1999): 47-54。
 - 3 趙麗明，《女書與女書文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 4 陳其光，〈女字的產生和性質〉；唐功暉，〈上江墟的婦女文字〉，收入史金波、白濱、趙麗明主編，《奇特的女書》，頁37-52。

他女書原件，再加上迄今類似錢幣僅此一枚，且由古幣收藏家在南京覓得，故有學者推論該幣可能是爲了因應古玩市場需要而仿造的偽幣。⁵另外一項直接證據是筆者蒐得的一本三朝書，其扉頁上載明「民國三年九月初四立」和「隨便書」等漢字。這些漢字究竟是出於女書婦女還是其家人（或夫或子）之手，實難辨明。⁶如是後者，則女書流行的年代至少在清末或更早。若根據女書報導人的口述追憶，則女書至少在十九世紀中葉，便已在江永普遍流傳。⁷

至於史料部分，現存的四部地方志《永明縣志》（永明乃江永 1955 年以前的舊名）都未提及女書。⁸目前所知最早提及女書的文獻，當屬民國二十年出版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該書在介紹永明縣勝蹟「花山」時記載如下：「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⁹文中所謂男子未能識之的「蠅頭細字」，當指女書。

第二份有關女書的相關記載，是江永縣文化局幹部周碩沂（1926-2006）在 1959 年編纂的《江永縣解放十年志》。在這份官方內部流通的油印稿中，周碩沂不但介紹女書，且將一份由江永婦女胡慈珠所書寫的女書載入史冊，這也是女書作品第一次入史：

女人過去受壓迫 世間並無疼惜人 只有女書做得好 一二從頭寫分明
新華¹⁰ 女子讀女書 不爲當官不爲名 因爲女人受盡苦 要憑女書訴苦情

當時年屆而立之年的周碩沂對女書興趣濃厚，不但下鄉各方蒐集女書原件，且親向胡慈珠學習女書，無奈隨之而起的一連串政治運動將他打成了右

5 李恩軍、徐釗，〈女書文字與太平天國〉，收入宮哲兵主編，《搶救世界文化遺產——女書》（湖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頁 224-231；（日）遠藤織枝，〈關於女書歷史的幾個問題〉，收入宮哲兵主編，《搶救世界文化遺產——女書》，頁 117-126。

6 一些女書老太太既識得漢字也能讀寫女書（如義年華、何豔新）；另有些老太太則只能讀寫女書（如高銀仙）。

7 另見唐功暉，〈上江壩的婦女文字〉。

8 清代四部《永明縣志》分別編纂於康熙六年（1667，譚惟一修，蔣士昌纂）、康熙四十八年（1709，周鶴修，王纘纂）、道光二十六年（1846，王春藻纂修），和光緒三十三年（1907，萬發元修，周銑詒纂）。明代曾編修兩部地方志，今僅存其序，餘皆亡佚。

9 曾繼梧編，《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上冊（湖南：和濟印刷公司，1931），頁 99。

10 新華即指上江壩鄉，1995 年改制爲上江壩鎮。

派，周碩沂的女書研究之路不得不劃下休止符。直到 1982 年，在女書即將步入歷史之際，女書才終被學者所「重新」發現。¹¹

由於女書是目前世上僅知的女性專用文字，它的神秘性立即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注意。大陸學者宮哲兵、趙麗明、謝志民，海外學者姜葳、史凱珊、遠藤織枝、劉穎、羅婉儀，以及湖南江永當地幹部周碩沂、唐功暉、楊仁里等，都先後加入採集女書的行列。經由學者過去三十餘年的努力，目前所蒐集發表的女書已達 500 則之多。¹²

學者所採集的女書主要涵蓋兩類：一是傳統的女書文本，例如：書寫在紅紙、扇上或帕上的結拜姊妹信函，以布面縫製裝訂而成的婚禮祝賀文書，俗稱「三朝書」（因這類女書是在「賀三朝」的婚嫁儀式中遞送），寫在單張紙上的女書「訴可憐」（俗稱「一條紙」），或寫在學校課業筆記本上的女書唱本等；二是女書老太太應學者之請而新寫就的女書，這類女書或為女書婦女的最新創作，或是她們根據記憶而寫。¹³ 而學者所據以徵詢、訪問的女書婦女又有兩種不同的類型：自然女書傳人和懷舊型女書傳人。「自然女書傳人」指的是在學者發現女書之前，就已習得女書的婦女。例如，1980 年代學者所仰仗的高銀仙（1902-1990）、義年華（1907-1991），和 1990 年代才被學者

11 關於女書的發現，請參考宮哲兵，〈導論：解讀女性文字的秘密〉，收入宮哲兵主編，高銀仙、義年華原作，《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臺北：婦女新知出版社，1991），頁 15-57。

12 宮哲兵主編，高銀仙、義年華原作，《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謝志民，《江永女書之謎》三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一種奇特的女性文字資料總匯》（以下所引，以主標題簡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趙麗明主編，《陽煥宜女書作品集》（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趙麗明主編，《中國女書合集》五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楊仁里、陳其光、周碩沂編譯，《永明女書》（長沙：岳麓書社，1995）；羅婉儀，《一冊女書筆記》（香港：新婦女協進會，2003）；遠藤織枝，《中国の女文字——伝承する中国女性たち》（東京：三一書坊，1996）；遠藤織枝，《中国女文字研究》（東京：明治書院，2002）；William Chiang（姜葳），*We Two Know the Script: We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5); Cathy Silber, *Nü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5).

13 「根據記憶」所寫的文本文分為兩類：一是追憶結拜姊妹信函、三朝書、唱本等傳統的女書文本（這類女書的原始作者多半不詳），另一種則是將原本就以口語歌謠呈現而不書寫成文的「女歌」（如民歌、小人仔歌、哭嫁歌），轉以女書記錄。

所發掘的陽煥宜（1909-2004）、何豔新（1939 年出生），以及 2000 年才決意以高銀仙孫女的女書傳人身分弘揚女書的胡美月（1963 年出生）。而「懷舊型女書傳人」則是在學者研究的啓發下，才開始學習女書的婦女，何靜華（1939 年出生）可謂箇中代表。

若就研究取向而言，中國學者多偏重女書文本以及文字樣本的採集，¹⁴ 甚至編纂女書字典。¹⁵ 至於海外學者，則多針對女書的某一特定文體進行探討。其中，最吸引學者興趣的當屬女書唱本，除了有四篇分析論文外，哈佛大學的伊維德（Wilt Idema）且將女書所轉譯的漢文唱本悉數英譯。¹⁶ 除此之外，女性之間的文書遞送，包括結拜姊妹書信和結婚賀禮之一的三朝書，也有四篇相關論文。¹⁷ 有關女書傳說敘事歌的部分則有兩篇，一是針對女書敘事歌《珠珠》的不同版本進行文本的情境分析，另一篇則是女書抗日歌的調

14 如宮哲兵主編，高銀仙、義年華原作，《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謝志民，《江永女書之謎》；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趙麗明主編，《中國女書合集》。

15 女書字典的編纂包括周碩沂，《女書字典》（長沙：岳麓書社，2002）；唐功暉、宮哲兵，《女書通》（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陳其光，《女漢字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6）；趙麗明等，《女書用字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謝志民、謝燮，《中國女字字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6 有關女書唱本的分析，請參考 Wilt L. Idema, “Changben Texts in the Nüshu Repertoire of Southern Hunan,” in Vibeke Bordahl, ed., *The Eternal Storyteller Oral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 pp. 95-114; Anne McLaren, “Women’s Voices and Textuality: Chastity and Abduction in Chinese Nüshu Writing,” *Modern China* 22.4(1996.10): 382-416; Fei-wen Liu (劉斐玟), “Narrative, Genre, and Contextuality: The Nüshu-Transcribed Liang-Zhu Ballad in Rural South China,” *Asian Ethnology* 69.2 (2010.10): 241-264; 劉斐玟, 〈情義、性別與階級的再現與超越：梁祝敘說與文體之音〉,《戲劇研究》5(2010): 27-68。關於女書唱本的英譯，請參考 Wilt L. Idema, *Heroines of Jiangyong: Chinese Narrative Ballads in Women’s Scrip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17 有關女性之間的女書遞送，請參考 Cathy Silber, “From Daughter to Daughter-in-law in the Women’s Script of Southern Hunan,” in Christina Gilmartin et al.,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7-69; Fei-wen Liu, “Literacy, Gender, and Class: Nüshu and Sisterhood Communities in Southern Rural Hunan,”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6.2(2004): 241-282; 劉斐玟, 〈書寫與歌詠的交織：女書、女歌，與湖南江永婦女的雙重視維〉,《臺灣人類學刊》1.1 (2003.6): 1-49; 劉斐玟, 〈文本與文境的對話：女書三朝書與婦女的情意音聲〉,《臺灣人類學刊》3.1(2005.6): 87-142。

查報告。¹⁸ 比較出乎意料的是，以女書來訴可憐的傳記書寫可說是女書的一大特色，但目前並無針對此一議題進行深入探討的研究論文，僅 Cathy Silber 的博士論文和趙麗明的《女書與女書文化》各有一章論及，但兩者所側重的角度有所不同。¹⁹ 趙麗明認為女書是婦女「自我意識與抗爭」的工具，但 Silber 認為女書當屬「抗爭」(protest) 與「屈從」(resignation) 的綜合體。趙麗明從文本切入；Silber 雖只討論三、四篇的傳記，但因她曾親從義年華學習女書半年 (1988-1989)，與義年華有密切的日常互動，故能將女書傳記書寫的研究觸角延伸至實踐 (practice) 的層面，在女書學者普遍偏重文字與文本的研究取徑下，Silber 的田野材料彌足珍貴。然，整體而言，女書「訴可憐」的傳記體例分析仍大有開展空間。有鑑於此，本文希望能在前人耕耘的基礎上，更完整地呈現女書傳記書寫的歷史意涵與文化格局；特別是女書的傳記書寫如何呈現一般主流史料少見的婦女觀點；又，當女書的自傳書寫因學者的介入，而成為出版產業的一環後，女書的文化面貌是否也隨之而異？

目前學者所蒐集出版的女書傳記文本約有四十餘篇，²⁰ 再加上筆者所蒐集的近二十篇，共六十多篇。老一輩的女書傳人 (1949 年以前出生的自然女書傳人) 幾乎都有自傳體的女書「訴可憐」，其中尤以義年華的創作力最為旺盛。

義年華可說是女書研究圈中的傳奇人物。出生於上江墟鄉棠下村的義年華，四歲父親去世後，便隨著 28 歲守寡的母親回到白水村的外公家居住，直到 14 歲才返回棠下，17 歲出嫁桐口村。由於祖父和外公都是書香世家，義年華自小便習學漢字，通曉《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書；回到棠下村後，且隨叔娘學習女書，創作水平頗高。現有的六十多篇女書「訴可

18 關於珠珠的敘事分析，請參考劉斐玟，〈開顯 Geertz 的深描闡微：女書文本的敘說、閱讀與展演〉，《臺灣人類學刊》5.1(2007.6): 63-107；關於抗日歌，請參考遠藤織枝，〈中國女文字研究〉，頁 232-251。

19 請參考 Silber, *Nü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p. 135-162; 趙麗明，〈女書與女書文化〉，頁 60-84。

20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的《中國女書集成》和趙麗明主編的《中國女書合集》二書，共蒐集了三十來篇；羅婉儀的《一冊女書筆記》也有十篇之多。謝志民的《江永女書之謎》則完全沒有收錄女書「訴可憐」；宮哲兵主編的《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也只收錄了二篇。

憐」，共記述了近四十位婦女的生平，²¹ 其中有一半婦女的傳記，皆出自義年華之手，估計約創作於 1980 年代。²² 她的創作豐富了女書傳記書寫的素材，也幫助我們瞭解農村婦女的生命情境。

除了義年華，本文要討論的另一位女書傳人是何靜華。如果說義年華是屬於自幼學習女書的傳統派，何靜華則是懷舊型人物。1939 年出生的何靜華，在 1996 年兒子去世後，才開始真正創作女書，因為「女書是訴可憐的」。1998、1999 這兩年她就創作了〈靜華訴可憐〉、〈靜華憶兒〉、〈念逝兒〉、〈我的悲苦〉等，以慰喪子之痛。²³ 2002 年，江永官方在女書發現二十年後，首度將目光移注到女書，除了在高銀仙的故鄉上江墟鄉浦尾村成立「女書園」外，²⁴ 翌年，更訂定「女書傳人評選管理辦法」（試行），由官方授證「女書傳人」的封號。而何靜華就是當時所授證的五位女書傳人之一（另外四位是陽煥宜、何豔新、高銀仙的孫女胡美月和高銀仙的媳婦義運娟）。²⁵

本文將以義年華和何靜華兩位女書老太太所書寫的共二十多篇女書「訴可憐」為主要素材，輔以過往女書學者的研究所得和筆者過去二十年來的田野考察，透過文本分析和書寫實踐的雙重視角，一方面冀求揭示婦女的視事觀點與生命情境；另一方面，亦得彰顯女書「訴可憐」作為婦女論述所隱含的多元意涵，進而探究「訴可憐」在當代社會的論述位置與發聲場域，特別是女書的研究與出版對女書傳記書寫的衝擊與影響。

二、婦女的生命情境與視事觀點

江永婦女在「訴可憐」中，敘說著什麼樣的苦情，又以什麼樣敘事觀點陳述？下文將以義年華所寫的〈谷母溪唐舉仙〉為例，²⁶ 鋪陳女書傳記書寫的

21 其中，義年華、高銀仙、陽煥宜、何豔新、何靜華等人都有一篇以上的「自訴可憐」。

22 關於義年華所編寫的女書傳記，請參考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趙麗明主編，《中國女書合集》。

23 目前有收錄何靜華女書創作的僅羅婉儀的《一冊女書筆記》。

24 「女書園」後改名為「女書生態園區」。

25 2010 年第二度授證時，又加上三名生力軍：周惠娟（周碩沂之妹，1941 年出生）、蒲麗娟（何靜華之女，1975 年出生）、胡欣（胡美月的學生，1988 年出生）。

26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04-309。

格局與雛形：

心慈做書雙流淚 想我出身不如人 大木頭村唐家女 公嬭所生五個人
 嬭養台爺多鬧熱 到此如今沒源流²⁷ 父母所生兩個女 又沒同胞親弟兄
 因為台爺落陰早 娘守空房兩朵花 名叫舉仙唐家女 落入夫家姓盧門
 來到夫家亦寒苦 家中貧寒哭盡多 想起回家無出氣 又沒弟郎開娘心
 我娘起身行歸步 見個弟郎亦是親 陪歸的爺亦是好 亦是算其似親生

「台」是女書中的自稱詞。1920年代出生的唐舉仙，在自訴苦情時，先從「公嬭」（即祖父母）那一輩說起，這種親屬定位在女書中經常見到，而且所列舉的苦情，涵蓋親族與家人。唐舉仙的祖父母雖膝下一子，但獨子早逝，遺下年紀輕輕就守寡的媳婦和唐舉仙姊妹兩孫女。對唐舉仙而言，沒有兄弟意味著沒有娘家當靠山；對母親而言，沒有兒子的寡居生活，前途茫茫，於是便帶著女兒「行歸步」，也就是改嫁，改嫁後且生一子。「陪歸的爺」（即繼父）對唐舉仙這個隨娘改嫁的「隨娘女」還算不錯，把她當親生女兒撫養成人。唐舉仙十八歲時出嫁黃甲嶺鄉的谷母溪：

來到夫家心中氣 眼淚潸潸落被頭 丈夫問台氣哪路 只氣家中不如人
 我夫勸聲慢想遠 夫妻勤儉慢慢操 如今來了六年滿 見個嬌兒開我心
 身邊有個嬌兒子 搭福嬌兒帶貴身 剛好上了二十四 兩個嬌兒沒憂心

夫家雖然貧困，但「夫妻勤儉慢慢操」，總會苦盡甘來。只是人事有盡時，沒想到因逢時局變遷，丈夫被抓去當兵，而大兒子也在丈夫當兵期間，因沒錢治病而離開人世。唐舉仙哀痛難抑：²⁸

因為以前舊社會 壓迫我夫去當兵 丈夫當兵到遠府 拋下房中三母人
 如今去了三年滿 只望上天保回家 吩咐兩個嬌兒子 沒爺在家好可憐
 我亦盡心照顧崽 夫不回家淚雙流 五月十八崽得病 得病沈重命歸陰
 若是我夫在家住 整好金佗養爺娘 如今無錢來修整 崽死陰司愁斷腸
 想吃糖果沒錢買 想吃肉來沒錢稱 嬭娘望起心中疼 與孫稱肉沒功勞
 將來得病五個月 子死陰朝心亂溶 剛好跨上九月節 我兒落陰好淚流
 四邊之人齊疼惜 可憐嬌兒沒世間 日夜哭子肝腸斷 哭煞房前人不知

27 「沒源流」即無子嗣之意。

28 義年華在跟 Silber 講述這則女書時，想到自己三歲夭折的兒子，也是潸潸淚下，不能自己。請參考 Silber, *Nü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 149.

跨出大門起眼看 不見金佗路上行 想起我兒講的話 幾時擱開我嬌兒
 將來年終時節到 家家屋屋過新年 人嘛一家同年會 是台哭子又氣夫
 丈夫當兵不歸屋 我兒落陰不回頭 時節不知時節過 一日不知一日完

遭受「丈夫當兵不歸屋 / 我兒落陰不回頭」的雙重打擊，唐舉仙接下來還得面對「守生人寡」的難題。²⁹ 自己既無力照顧農事，夫家的兄弟又不願伸出援手，唐舉仙不覺緬懷起丈夫在家的日子「又有春來又有冬」：

外面工夫無人做 家中事情獨個當 請人種田入心氣 田中整水淚雙流
 寒天霜雪真難過 沒樵爇火受凄寒 疼惜之人爇下火 想起我兒沒世間
 只說哥哥細哥好 田地拋荒亦無糧 如今去了四年滿 叔孫不得照顧身
 若是叔孫照顧我 後日夫歸要報恩 先前寒苦亦受過 到此如今更加難
 想起前生台沒份 身在房中眼淚流 以前我夫在家做 又有春來又有冬
 拋下台身多受苦 望天保佑早回家 日日望夫不到屋 幾時回家共團圓

困境如斯，唐舉仙何去何從？公婆勸她守節，以便把她唯一的兒子拉拔成人，但守寡四年後，生計維艱，唐舉仙最後決定帶著兒子改嫁：

我的爺娘勸解好 勸我紅花慢慢操 身邊有個嬌兒子 養大小兒報你恩
 你是生成這樣命 養大細崽待娘身 如今來了八年滿 百路煩心台請全
 田中沒收台沒吃 四路無門走哪方 又想將身行歸步 拋賤嬌兒心不歡

唐舉仙幼時曾是「隨娘女」，沒想到她自己的兒子也淪為「隨娘仔」。更可嘆者，「陪歸丈夫」（再婚之夫）的母親對她很不友善：「陪歸夫母噁心盡 / 拿我將身不算人」；而她自己的兒子隨娘改嫁不到一載也離開人世。還好，唐舉仙雖年逾四十，還是與陪歸丈夫生下一子，也算聊可慰藉：

陪歸丈夫亦是好 待我嬌兒總親生 陪歸夫母噁心盡 拿我將身不算人
 嬌兒養了九歲滿 子死陰朝氣入心 身邊有個紅花女 時時有愁亦見歡
 陪歸丈夫生個崽 四十有餘我心歡

有子萬事足。但在這篇訴可憐的結尾，唐舉仙卻欲言又止，似乎有苦難言：

養得嬌兒成長大 眼淚四垂哭盡多 夜間上床被哭透 台的可憐人不知
 好情好意台沒得 醜情醜意台受多 點盡清香不效驗 受盡惡言天不休

29 在江永，丈夫因抽兵而生死不詳的婦女，稱「守生人寡」。

吃盡生薑受盡辣 吃盡胡椒辣盡心 吃得做得容易過 身有病中十分難
 亦想將身自縊死 又疼夫主陪哪人 將身就世容易事 又要與子遮面皮
 想起嬌兒是單薄 又惜嬌兒又惜孫 年剛將來六十七 砍樵養牛過時光

唐舉仙的「訴可憐」揭露女書傳記書寫的重要特質：失去「三從」依恃時所衍生的苦情，特別是寡婦和失怙子女的處境；此外，娘家、夫家、婆婆的態度也左右寡婦的前途；時局的動盪更牽引著婦女的命運。以下，將分別探討女書「訴可憐」中常見的幾個課題：寡婦的去從、失怙子女的歸宿、變動中的婆媳關係和時局動盪。

（一）寡婦的去從：守寡與再嫁

在江永一帶，寡婦如果無子無女，通常會走上改嫁一途。如有子女，那麼改嫁與否所牽涉的因素就較為複雜，包括家庭經濟、與娘家的關係、與夫家的互動等。如若有兒子相互依傍，那麼只要生活支撐的了，婦女通常會選擇守寡。義井居的女書「訴可憐」中（義年華寫），提到她 28 歲守寡的祖母即是一例：³⁰

嬾守空房二十八 日夜哭夫過時辰 五更不眠透夜哭 越想傷心刀割腸
 又沒家財吩咐台 家中貧寒受苦辛 雖然同胞有三個 不得照顧種田莊
 千般事情不照顧 請人種田十分難 四邊郎叔齊疼惜 勸我安心守嬌兒
 苦守成家功勞出 長大成人報你恩 日間可如夢中過 朝夜不知朝夜完
 家中貧寒沒一樣 與人做衣過時光 相伴姑娘³¹繡花色 各位姑娘解開心
 日月如梭容易過 守大台爺娶台娘

抱著兒子有朝一日「長大成人報你恩」的期望，即便夫家的郎叔伯爺「不得照顧種田莊」，義井居的阿嬈還是決定留守夫家。在「各位姑娘解開心」的情感支撐下，總算苦盡甘來，「守大台爺娶台娘」、「苦守成家功勞出」。

當然，有些寡婦即便有了兒子也會選擇改嫁，為自己打開又一扇生兒育女的大門。以唐舉仙為例，前夫遺下的兒子先後夭折，所幸她改嫁後又與陪歸丈夫生下一子，總算晚年有所依靠。不過，改嫁也有它的風險，蓋改嫁

30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23-331。

31 姑娘：姑媽、姑姑。

後，婦女與前夫的家族不再有任何牽連，即便是帶著隨娘仔改嫁，隨娘仔長大後，也會返回生父的村子，繼承家業。易言之，改嫁對婦女而言，意謂人生新頁，一切重頭開始。改嫁後，如若未能順利生子，那麼她就只能靠陪歸丈夫的「前頭仔」（再嫁之夫與其前妻所生的子女）過日子，前景難料。楊細細就是此中受害人。³² 楊細細的丈夫好賭，「將我拋在賭錢檯」，又不時毆妻，三個兒子相繼病歿，只有幼子尚存。楊細細一度懸樑自縊，但獲救後只是招來丈夫又一頓毒打。1949年之後，女子有了離婚的權力，楊細細「想起丈夫心太毒 / 走到江永（縣城）來告官 / 只望上級救我難 / 一刀兩斷兩離分」。離婚獲准後，楊細細再嫁，「前夫無緣分離別 / 再配好夫我安心」。陪歸丈夫有四個前頭仔，楊細細「衣襟抱過是爺娘」，當親生子女一樣撫養。只沒料到兒子長大後，在他外婆的慫恿下，起了歹意：「圖財害命挖眼睛」。被弄瞎眼的楊細細不但沒錢整病，還落得在街頭流浪，「日日討吃過時光」，而就在討吃的路上，碰見了自己的親兒子。「崽見娘親眼淚飄」，但也莫可奈何。因為楊細細改嫁後，她與兒子的親屬關係不復既存，她也不能再返回前夫家居住。兒子唯一能做的只是「出錢買屋」讓母親有棲身之處。

相對而言，守寡也有守寡要付出的代價，那就是生計壓力。義年華所寫的〈二十八歲守寡媳婦不孝〉道出其中艱辛：³³

拋下子女年紀細 我亦年輕守空房 父母心粗分開台 三母空房倚哪個
 ……
 修書一本轉回府 告訴弟郎疼惜聲 姊的路長不中用 千般可憐弟不知
 只碗雙箸沒吩咐 房屋居住沒安身 田地功夫沒人種 時刻哭愁過時光
 設此離得三五里 弟郎照顧種田莊

如果同屬一個大家庭，寡婦還可仰仗家族其他男性成員的勞力來養家活口；可是一旦「父母心粗分開台」（分家），那麼寡婦就得獨自面對「田地功夫無人種」的窘境，特別是整水、割禾這種需要大量體力的工作。如果娘家就在左近，弟郎或可前來幫忙務農，否則也愛莫能助，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這名寡婦要「修書一本轉回府 / 告訴弟郎疼惜聲」。然，一旦夫家、娘家都不可恃，農活又做不來的情形下，寡婦養家活口的門路，就是替人踏碓、養牛、

32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93-297。

33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78-381。

做針線：

左思右想無計策 替人踏碓過時光 亦叫台□做針線 慢慢逃難養嬌兒
 朝朝起來與人做 烏雲底下過時光 一嘛只靠上天疼 三母受苦沒星辰
 夫死之時子兩歲 二十八歲守空房 夫死如今子十二 與人養牛過時光

若真不足以餬口，有些甚至淪為乞丐。王轉初就曾帶著三子一女經歷「日間討盡千家米／夜間神內去安身」的困境；所幸，靠著中共建政後的土地改革，他們總算脫離了食無米、居無所的流浪歲月：³⁴

日夜哭夫肝腸斷 幾時養大四個人 有爺生來無爺養 透夜哭夫刀割腸
 錢銀整了幾十萬 人財兩空沒功勞 又沒田地吩咐台 又氣錢米難填清
 上無兄來下無弟 舉目無親靠誰人 上無磚瓦下無地 房屋居住沒安身
 ……

日夜哭夫真無路 只是討吃過時光 日間討盡千家米 夜間神內去安身
 如今只靠毛主席 每人分下種田莊……如今兒女年長大 分下田地過好時

有些寡婦家境好些，則可仰仗「批田」（田地租給他人耕種）自給自足，經濟相對無虞。女書傳人何豔新的母親便是仰仗出租四畝「隨嫁田」（嫁妝田）過日子，她甚且帶著獨生女回外家守寡，何豔新還因此得以從外婆那裡學會女書。³⁵ 義年華的母親是另一個回娘家守寡的例子：³⁶

台娘名叫何光慈 父親名叫義昔君 二十七歲落陰府 拋下台娘守空房
 爺死之時台四歲 妹娘一歲不知天 上無兄來下無弟 台馳空房沒開心
 娘守空房年輕少 外公外婆多慮心 叫我細舅來接馳 三母常常在舅家
 兩個舅爺多惜疼 兩個姨娘解馳心 兩個舅娘書家女 本是知輕見理人
 時刻坐齊勸台馳 可比以前在馳邊 父母剛強在上 幾個同陪解開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書「訴可憐」中，除了從寡婦的觀點來陳述可憐外，也從女兒的角度來看寡母的處境。出生於黃甲嶺鄉西村的何井居在義年華幫她寫的「訴可憐」中就提到：³⁷

34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88-393。

35 有關何豔新的生命史，請參考 Fei-wen Liu, *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4。

36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77-292。

37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14-318。

把筆修書雙流淚 訴說可憐傳四邊 我是出身西村女 娘守空房兩朵花
 七歲沒爺焦枯女 台娘年輕守空房 連襟妹娘一歲滿 不得裝根亦落朝
 公嬭所生是四個 一個姑娘叔二個 上無兄來下無弟 娘守空房沒開心
 我娘守節年輕少 日夜哭愁過時光 設此台身度作子 得曰填歸父的名

母親有身為寡婦的苦，何井居也有她身為女兒的愁，那就是不能替母親分憂：「設此台身度作子 / 得曰填歸父的名」。江永實行從父居村外婚，亦即女子必須出嫁外村，改嫁亦然，故曰「出鄉」。³⁸ 正因爲要「嫁出鄉」，何井居才會感嘆：「養錯女兒真沒用」，蓋一旦出鄉，「娘守空房陪哪個」：

有爺生來無爺養 幾時氣煞醜命人 前日有爺千日好 娘守空房受苦辛
 台娘房中多急曲 透夜不眠刀割心 養錯女兒真沒用 長大成人嫁出鄉
 嬭娘年高落陰府 娘守空房陪哪個

何井居之所以憂慮寡母晚年，一方面是因爲江永婦女一般不務農事，一旦喪夫，就得面臨「寡婦求人十分難」的艱苦生活：

田地工夫無人顧 舉目無親靠誰人 上山砍樵雙流淚 幾時養大女兒身
 求人種田入心氣 田中整水淚雙流 請人割禾也急曲 寡婦求人十分難

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何井居父親的家族人口凋零，寡母年老後，情感難有憑藉。蓋家族中，年輕早逝的除了父親，還有二叔。二叔辭世後，二叔娘改嫁他人，遺下的幼兒如何是好？撫孤的重任原先是落在嬭嬭肩上，但不到兩年，嬭嬭辭世。堂叔娘便接下重擔：

嬭嬭剛強顧孫子 顧了兩年嬭落陰 嬭嬭年高落陰府 孫子可憐無處安
 同親叔娘有心惜 夫妻商量下顧孫 如今只算上天惜 孫曾滿堂報叔恩

何井居在她的「訴可憐」中，一方面替母親傾訴守寡之苦，一方面也宣洩她身為女人必須出鄉別母的遺憾，三則揭露女書除了傾訴可憐外，也是婦女表彰他人恩德的敘說場域。二叔遺下的孤兒，便是由同宗的堂親叔娘負責照料。何井居本人雖不是受恩人，但卻特別提上一筆，既是表彰，也是替當事人表達感恩之念。

何井居的母親、何豔新的母親、義年華的母親，都是只有女兒而無子嗣，總有一天，她們都要面臨女兒出鄉後，一人獨自神傷的哀淒與寂寞。

38 直到 1949 年以後，外村嫁娶的禁忌才得鬆綁。

但儘管如此，她們並沒有為自己尋找第二春，為自己打開一條傳宗接代的門路，因為她們知道，一旦改嫁他鄉，她們的「紅花女」（女兒）很可能就此淪為童養媳。³⁹

（二）失怙子女的歸宿：童養媳

在男性宗族社會裡，兒子擔負著「上事宗廟，下繼後世」之責，所以即便父母、祖父母已不在人世，同一宗族的其他親人往往會代盡撫養之責。如果遺孤是女兒，那麼就多了些變數。有的會由公嫗或叔娘、伯娘照顧；例如，三歲喪父、六歲喪母的歐春色（1909-1983），就靠著「同胞伯娘盡心惜／照顧姊妹成長大」（義年華寫）；⁴⁰ 另一位婦女何羅疏（ca. 1910-1980s）也是六歲喪父，母親因膝下無子，「公嫗房前言語多／年輕守節無倚靠」，故而「改步行」（改嫁），留下何羅疏由公嫗照顧，公嫗去世後，叔娘「有心疼惜我」，撫養她直到 20 歲「交全」（嫁娶）桐口村（義年華寫）。⁴¹

相對而言，住在棠家村的菊陰，則有不同的命運。菊陰的母親去世後，父親再娶後娘。父親去世後，後娘便帶著親生兒子改嫁，遺下菊陰乏人照看。菊陰的外婆年老也無力撫養，便把菊陰提前送到夫家當童養媳（按江永傳統婚俗，一般人多在襁褓或幼時即已許親）。菊陰運氣不錯，「他家爺娘本是好／算我紅花一樣陪」（義年華寫）。⁴² 何春色是另一個例子。何春色起初以隨娘女的身分隨母親改嫁，但不到二年，在「繼爺與母共商量」後，年僅 12 歲的何春色，還是被送到自幼許親的田廣洞（道縣）當童養媳（義年華寫）：⁴³

台娘起身行歸步 台亦跟其到別村……陪歸繼爺本是好 算我親生一樣陪
 來了兩年上三載 繼爺與娘共商量 想台年剛十二歲 交全過他不老成
 自細許配田廣洞 陪夫八年二十春 我來陪夫八年滿 不覺有妊在其身

去了八年後，才「不覺有妊在其身」，主要原因是童養媳到了夫家後，一

39 改嫁必須離鄉，所以衍生出子女去從的問題；若是鰥夫，那麼再娶進一個後母或是二娘，便司空見慣了。

40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42。

41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02。

42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98。

43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09-313。

般不會立即合房。也是童養媳出身的呼新奎（1934-2012）表示：她十歲出嫁到婆家後，便一直與婆婆睡一起，直到未婚夫高中畢業，兩人才舉行正式婚禮。⁴⁴

上述所提到的王轉初也是童養媳，但經歷更為坎坷。因「哥哥當兵到遠府／不知骨頭在哪方」，父母憂思辭世，唯一的弟弟又隨之病歿，家中親族無人願意照養王轉初這個十歲的孤兒，她的外婆「年高難照顧」，便把她送到層山陳家村的夫家去。但到了夫家後，「他家駝娘看不起」（女書多以「他」來指涉丈夫），對王轉初這個童養媳百般虐待：⁴⁵

靜坐空房把筆寫 訴我可憐傳四邊 台是出身街上女 我名叫做王轉初
 ……
 轉初年輕十歲滿 沒娘沒爺陪哪個 外婆年高難照顧 送我層山陳家村
 他家駝娘看不起 拿我將身不算人 一日吃的是清粥 又加清水來做湯
 一家事情要台做 腹中不飽沒精神 一餐一碗清粥水 餓得面像死人形

後來經由六伯出面向鄉長提出申訴，鄉長瞭解實情後，心有不忍，便把王轉初接到自己家中調養，爾後，甚至幫她重新安排一樁婚姻：

六伯告訴鄉長聽 請示鄉長聽言章 姪女可憐無父母 送到層山陳家村
 他家爺娘看不起 惡起孫女不像人 一日三餐吃清粥 亦加清水來做湯
 一餐只是吃一碗 孫女餓得不像人 一家事情要她做 腹中不飽最難當
 難做事情又罵整 孫女可憐無處安 鄉長一聽心中惜 留下轉初在家中
 鄉長養了一個 身體健康不作難 吃飽穿暖身體好 家中事情亦不憂
 見事做事得人愛 鄉長介紹白水村

一到白水村的新家，王轉初發現丈夫極為貧窮，但她並無怨言，因為「丈夫本是感情好／縱然家苦水亦甜」。15年後丈夫病歿，拋下三子一女由年輕守寡的王轉初撫養。夫家原本窮困，再加上丈夫治病所需的費用，「錢銀整了幾十萬／人財兩空沒功勞」，家底更見單薄，王轉初孤兒寡母終至淪落到乞討的地步。

在王轉初的訴可憐傳記中，還有一段轉折值得一提：那就是兒女成家，

44 關於呼新奎的生命史敘說，請參考劉斐玟，〈文化與歷史的透視鏡：中國農村婦女呼新奎的生命史敘說〉，《臺灣人類學刊》10.2(2012.12): 139-195。

45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88-393。

正當「人人妒台好過日 / 苦守成家出功勞」之際，她和媳婦之間卻產生了誤會，媳婦甚至因此「吃了農藥命歸陰」：

如今四個命勻稱 個個兩兒一朵花 人人妒台好過日 苦守成家出功勞
我在高堂自歡喜 孫曾外甥滿堂紅 不知婦娘那樣想 說我妄言大不該
枉台吃了一腳肉 心中受急大不該 想來想去不得吃 要與婦娘說分明
叫起叔孫來對證 叔孫證明不得稱 誰知婦娘性情陡 吃了農藥命歸陰

不幸既已造成，王轉初只能賠罪，因為「就是不錯亦錯啦」：

急忙叫人外家報 父母兄嫂看分明 外家到來雙腳跪 就是不錯亦錯啦
大郎本是知情理 雙手拉起親家娘 妹娘已是性情陡 死了陰司不回頭
妹娘死了是沒用 望你剛強下顧孫 保重身體顧孫曾 孫子孫女靠奶娘
親家娘你想想遠 兩母大儕個解個⁴⁶ 慢訪慢查娶歸個 娶歸好妻不見愁
兒女有娘多為貴 衣襟抱過是爺娘

如果說何井居的訴可憐是「略將提言四邊知」，王轉初的女書則是在「訴我可憐傳四邊」之餘，也想藉此申訴自己的委屈，捍衛自己行止的正當性，同時也藉由媳婦娘家的諒解，來撫平自己內心潛在的罪惡感，畢竟「妹娘已是性情陡」，更何況「死了陰司不回頭」，重要的是，往後的日子她還得承擔責任：既要「下顧孫」，還要幫兒子再「娶歸好妻」。

王轉初的訴可憐凸顯出婆媳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在所有的女書中，尤以煥珠的故事最具「戲劇性」。

（三）變動中的婆媳關係

煥珠的「訴可憐」也是從祖父母那一輩說起，「嬾嬾年輕守空房」，雖說家有田產，但村人看她寡婦好欺負，便去偷穀，所幸嬾嬾的娘家有兄弟，他們不時前來接濟，總算把兩個孩子都撫養成人，且嫁娶生子。無奈兒子雖生了三子一女，但三個兒子皆沒養起，只有煥珠倖存，可是女兒抵什麼用？「養起女兒是沒用 / 長大成人忘父恩」（義年華寫）。⁴⁷

更無奈的是，煥珠的婆婆非常苛刻。煥珠的父親生病時，婆婆不讓兒子前往探病；煥珠的母親去世，她不讓身為女婿的兒子前去送終，而婆婆敢如

46 「個解個」：相互勸解。

47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96。

此對待煥珠，正是欺她沒有兄弟：⁴⁸

台身年將二十歲	父母交全夏灣村	配與桂福爲夫主	一家遙遙並沒憂
台到夏灣一年滿	父親得病在高床	他娘本是心腸毒	不給我夫看我爺
台爺床中十日滿	娘又得病上高床	台爺床中未曾好	娘得重病命歸陰
再說他娘真可惡	不給崽來送上岡	父母養女如珠寶	交全到他亦如人
誰知他娘看不起	刻薄台身無弟兄	台娘終身辭別世	女婿不來送上崗

那時候正值日軍侵犯江永（1944），村民紛紛拿著鼎鍋、衣物、糧食，走避山嶺逃難，稱「走日本」。而煥珠的婆婆也藉此機會，叫媳婦回娘家避難，同時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外地，事隔七年後，再以兒子沒有回家爲由，以4000斤穀子的價錢，把煥珠賣給別人當老婆：

到他兩年走日本	叫我回家跟台爺	他娘叫子一齊走	丈夫本是有感情
夫妻相連不拆伴	夫顧妻子一同行	他娘心中用計策	暗中叫子到別州
瞞起台身不知得	不知丈夫在哪方	早起望夫望到黑	不見我夫轉回家
透夜不眠透夜哭	日日望夫不回家	將來守夫七年滿	解放四年夫不歸
他娘心毒要嫁我	四千斤穀嫁我身	安心守夫我不去	守夫七年夫不歸
始我起身行一步	來到桐□姓盧村		

1953年，煥珠改嫁桐口，日子回歸平淡。只是萬沒想到，改嫁36年後，前夫竟從臺灣返鄉探親？！一切的一切，只能怪罪婆婆「心腸毒」：

己巳年間夫歸屋	我亦回程看夫君	一見夫主雙流淚	四十多年各別天
想起你娘心腸毒	拆散鴛鴦兩路行		

婆婆「拆散鴛鴦兩路行」，以4000斤稻穀的價錢「賣媳婦」，是蓄意而爲，還是她也認爲兒子已身死他鄉？在江永，一些無兒無女的婦女，一旦丈夫當兵不歸，往往有被「賣」之虞。夫家此舉主要在於經濟考量：一方面是減少損失。媳婦不事生產，又未撫育後代，卻佔一份口糧，從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實在得不償失。另一方面則是增加收益。夫家除可收回原屬於兒子的那一份家產外，還可從媳婦的陪歸丈夫手中，拿到一筆權利金，稱「分離錢」。筆者所採訪過的王剛珍老太太（1914-2003），在她所編唱的女歌訴可憐中，很諷刺地描繪夫家嫁媳婦的雀躍與醜態：⁴⁹

48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394-398。

49 關於王剛珍的「訴可憐」，請參考劉斐玟，〈書寫與歌詠的交織：女書、女歌，與湖南江

收我兩千二百塊⁵⁰ 年終擺出買糧田 買得糧田有四畝 有吃有嫖心又歡
嫁卻媳婦置田地 兄弟承攬要命消

在傳統農業社會，受制於宗族社會結構以及家產繼承制，公婆手握經濟大權，媳婦相對處於弱勢。何春色在她的女書「訴可憐」中，便直言不諱的指控婆婆待她如「奴婢」：⁵¹

桐口老娘看不起 拿台將身不算人 養起我兒心歡喜 殺雞一頭待台身
……
三餐上台吃白飯 算我奴婢一般形

1901年出生的盧八女（1901-1984）甚至還沒進婆家，婆婆就開始展現權威，不准她讀書識字（盧八女作）：⁵²

年紀長到七八歲 八女入了學堂門 各位教員皆得意 都說是個好學生
八女聰明多伶俐 讀書全不結禍根 無奈修苟老頑固 聽信妻言無主張
搭信阻止八女讀 管起不准讀文章 女人只是學針線 何必女人入學堂
……
女人讀書將何用 浪費金銀錢用空

但是隨著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乃至 1980 年代以後的承包制，婆媳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了轉變。田產不再來自家庭繼承，而是國家分配，年老的公婆失去了經濟掌握權，反倒要仰賴兒子媳婦代為種田以便餬口。上述所引用的〈二十八歲守寡媳婦不孝〉的當事人，就在女書中訴苦。她歷經萬難好不容易將兒子撫養成人，沒想到娶了媳婦之後，一切都變了：⁵³

今年我兒十八歲 亦要與崽結婚姻……人人都道守出運 苦守成家出功勞
娶個婦娘台歡喜 台算紅花一樣陪 來了兩年本是好 不知誰人講變心
講變婦娘分開台 分開獨家冷冰冰 有時有節台沒份 台是台頭借眼看
有菜有□台沒吃 台崽不敢覓娘親 一日三餐吃白飯 台去人家討點湯
疼惜之人給點台 人家又曰有嬌兒 夜間上床透夜哭 幾時哭煞老年人

永婦女的雙重視維》，頁 1-49。

50 2200 元是王剛珍的改嫁之夫周小苟賣四畝田所得。

51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09-313。

52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48-358。

53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80-381。

今年年終六十六 停歸四年七十春

義年華所寫的〈吳氏修書訴可憐〉也有類似的場景。吳氏的媳婦不願奉養婆婆，才娶進門不到兩個月，便要含辛茹苦養大兒子的婆婆改嫁他人；甚且暴力相向，要將婆婆趕出家門：⁵⁴

想我養兒如珠寶 長大成人操盡心……娶個婦娘台歡喜 台算紅花一樣陪
誰知給來台沒份 娶個婦娘言語多 婦娘來了兩個月 開言叫我改步行
年輕守節台不去 台有家規不亂行 娶錯何家牲豬母 打台將身幾多回
只是我兒沒才事 娶得婦娘變了心 夫婦同心不養台 當時將台趕出門
三餐上台又搶碗 夜間上床沒被鋪 大隊幹部來勸解 也不遵依幹部情
台有田地不分穀 當時趕出無處安

所幸，吳氏的三個女兒和女婿都很孝順，他們接她前去安住。不過，想到兒子如是對待親娘，終究有憾，於是寫下這篇女書，「告訴四邊齊疼惜 / 疼惜前生修不全」：

世間養兒來待老 台養嬌兒變了心……不知我兒哪樣想 將就妻子不要娘
年輕養兒多勞苦 誰知年高有字難 日夜哭愁入心氣 透夜不眠刀割心
心中想起無出氣 自己修書訴可憐 告訴四邊齊疼惜 疼惜前生修不全

(四) 時局動盪：戰爭與抽兵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可謂戰亂頻仍的年代。先是 1927-1937 年的國共內戰，接著是八年的中日戰爭。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原以為就此國泰民安，殊不知第二次國共戰爭又起。其中，又以 1944 年日軍入侵江永對村民的衝擊最為直接。據村民報導，當時女子被擄者，多半先行強姦爾後殺害，即便是孕婦也難逃此劫。唯恐遭日軍擄掠姦殺，村民紛紛走避，逃往山嶺避難，故稱「走日本」。女書裡有好幾篇傳記都記載著走日本的苦楚。義井居的「訴可憐」便寫道（義年華寫）：⁵⁵

三十三年走日本 娘守空房受急憂 一兒一女年紀小 嬾嬾年來受苦辛
又氣老娘難行動 又惜我兒亦難背 人嘛有夫商量食 寡婦無夫自身當
住在深山幾個月 老幼一家受雪霜 走上大嶺落大雪 老小寒得無處安

54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44-347。

55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26。

義年華在她的自傳裡也描述其中片段：⁵⁶

三十三年走日本 寡婦沒夫好可憐 人人有夫拿糧食 是我無夫淚雙流
 大女年剛十四歲 小女年剛六歲人 引起女兒走日本 獨個拿米到山林
 走到山中流珠哭 沒夫起廠沒安身 伯叔看見齊疼惜 叫我入廠去安身
 ……

住在山中幾個月 受盡寒霜雪上眠 桐口嶺上雪停了 連夜走到棠下村
 棠下弟郎多疼惜 送我嶺上去安身……棠下嶺上安心過 想到桐口拿衣裳
 房中妹孀的弟弟 叫他與我拿衣裳……到了桐口住一夜 拿衣拿米就起身
 出了桐口半里路 日本趕上搶衣裳 日本捉起親家弟 受了壓迫刀割心
 性命不知生是死 氣煞台身並無魂

時值冬季，天寒地凍，且在山嶺上一躲就是把個月，糧食用罄之後，村民便得冒著生命危險，回到日軍盤據的村子取衣取糧。義年華夫家的妹婿就是回桐口幫義年華拿衣物時，不慎被日軍擄獲，所幸他命大，得從日軍手中逃脫，否則義年華要為此抱憾終生了。

除了日軍侵華，抽兵也是影響婦女生活的重要因素。白水村的黃連珠即是一例。黃連珠 16 歲結婚，婚後因身體狀況不佳，一直未能生育，婆婆對此很不滿，「拿我將身不算人」，夫妻感情也因之生變，黃連珠被迫回娘家調養。在娘家好不容易把身體養好了，丈夫卻被捉去當兵：⁵⁷

想起以前舊社會 提起抽兵真可憐 家有三人抽一子 家有四人抽一雙
 十八抽到四十五 還有家中幾多人 年齡合格二五六 再抽一期三十三
 父母所生三兄弟 抽我丈夫去當兵……有錢人家買兵去 我家無錢自身當
 三十六年起身去 父母妻子淚雙流

由於長年戰亂，兵源不足，國家不時的抽兵、抓兵。江永有一俗諺很能捕捉這種戰事頻仍的景況：「湖南良子最難當 / 一根皮帶一根槍 / 吃了夜飯去放哨 / 夜裡放哨到天光」。唐寶珍的先生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抓去當兵，「丈夫當兵到遠府 / 身死別州不回程」（唐寶珍作），最後逼得唐寶珍只能改嫁。⁵⁸ 而黃連珠的先生則是在第二次國共戰爭時被抽兵，或稱之為「檢兵」。

56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82-284。

57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35-336。

58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70-371。有關唐寶珍的

被檢兵之後，有錢人可以花錢買兵當「替代役」。江永那幾年經歷戰亂，民不聊生，有些人爲了養家也只能賣身。呼新奎的大伯就找到這樣的一個頂替者，條件是給對方 20 擔穀子以奉養他的老母親。黃連珠的丈夫家窮，無錢買兵，只好「自身當」。不過，比唐寶珍幸運的是，幾年後，黃連珠的丈夫竟然平安返家，「千里姻緣二世陪」，黃連珠欣喜之情難抑：⁵⁹

丈夫當場到遠府	不知我夫幾時回	四九年來五月節	五月二四夫回家
丈夫回家齊歡喜	叫起弟郎接台歸	台在細姊家中住	弟郎接台轉回家
台問弟郎有啥事	弟郎說言哥回家	一聽丈夫轉回府	兩腳騰雲快回家
一見我夫心歡喜	可比見了寶與金	一家團圓齊歡樂	花再重開月再明
夫妻同房成雙對	千里姻緣二世陪		

由於是喜劇收場，義年華便在這篇自傳中安上「先苦後甜」的標題。

上述這些女書「訴可憐」，凸顯了江永農村婦女在二十世紀面對時局更迭的生命經歷，以及她們觀看這些生命經歷的觀點，包括婦女如何以親屬關係自我定位、婦女身爲女人的遺憾、守寡與改嫁的兩難、婆媳權力關係的移轉，乃至戰爭如何左右日常生活等。頗堪玩味的是，這些不同面向的議題與觀點，都統攝在「訴可憐」的情感概念中。更具體地說，女書雖是以「訴可憐」爲主調，但「可憐」不僅是現象學上的情感狀態，同時也是一具有超越性意涵的社會論述，它在反映當事人的內心世界之餘，也能衍生出可憐之外的情感特質，形塑出另一種超越可憐之情的論述。就如同上述所引述的女書傳記中所呈現，婦女所謂的「訴可憐」，不全然是一己之可憐，而是涵蓋她們對身邊親族成員之關愛；且在訴可憐的同時，也自我表彰「苦守成家出功勞」；在「訴可憐」中，或控訴他人不義，或申辯自己無辜；在可憐的論述中，既是博取他人「齊疼惜」，也藉機對那些曾在她們歷經苦難時，向她們伸出援手的人或事，表達感恩之情。易言之，「可憐」同時指向關愛、韌性、抗議，伸張正義，表彰善舉，乃至表達報恩之心等。

當然，既是論述，必涉及權力關係，也因此有所謂的可說與不可說，能

生命史另請參考 Fei-wen Liu, *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ch. 3.

59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336。

說與不能說，⁶⁰唐舉仙在她的女書「訴可憐」中提到的「又要與子遮面皮」，透露些許玄機。的確，自傳體書寫也有其特定的論述位置或侷限，特別是當女書從婦女日常的生活實踐進入當代學者的研究視域，乃至受到出版的衝擊後，其論述場域也面臨了新的挑戰。

三、書寫實踐與出版場域

上述所引的女書傳記，除了王剛珍、唐寶珍、盧八女的「訴可憐」外，餘皆出自義年華之手。學者在 1982 年發現女書後，因江永電視台播映此一新聞，有些老太太從電視上得知還有人能寫女書，聞風而至，前來請義年華幫她們寫女書。義年華自己也說：「只有當事人有所要求，她才會幫她們寫『訴可憐』。」⁶¹ 至於是當事人口授而義年華筆錄，還是由當事人講述生命經歷，再由義年華撰述成文，則不得而知。

請「槍手」代為撰稿的，在女書三朝書的書寫中，最為常見。逢親人嫁女，而自己又有苦情要訴時，便會請人代寫三朝書。女書傳人何豔新的外婆就是寫三朝書的箇中高手。從小就跟外婆學女書的何豔新回憶道：「嫁女的時候，每一年都有五、六個來叫我外婆寫（三朝書）」。外婆在寫三朝書之前，會問對方：「有什麼可憐啊？」對方就講她「家裡出身啊，或者沒有兄弟、沒有父親……」，「外婆再根據他們的情況，寫出道理來」。少不更事的何豔新當時還很好奇：「外婆，你問了這麼幾句你就會寫嗎？」外婆回答她：「哎呀……怎麼不會寫，就像寫信一樣啊。」⁶²

三朝書因是婚嫁文書，所以請高手執筆，但說起「訴可憐」的編歌傳統，倒是很多婦女都能朗朗上口幾句。這些「訴可憐」的女歌可經由女書老太太的記載，化身而為女書。不識女書的唐寶珍就透過她的結拜姊妹高銀仙，將她所編的「訴可憐」以女書記載下來，「因為我希望別人知道我的可憐」。曾跟胡慈珠學過女書的江永文化館退休幹部周碩沂也告訴筆者，盧八女

60 Kamala Visweswaran,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51.

61 Silber, *Nü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 147.

62 Fei-wen Liu, *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p. 89.

的女書「訴可憐」就是由他代為執筆。盧八女識得女書，但晚年因手疾無法動筆；1980年代初期從電視上得知她的老鄉周碩沂也能讀寫女書，便到縣城拜訪周碩沂，希望他能將她自編的「訴可憐」寫成女書，周碩沂寫完之後，且需經由她過目無誤後方可。有些老太太有寫女書自傳的念頭，但身邊若無人可以代筆，那麼她們可能轉以漢字記錄。姜葳的研究指出，有一位老太太就曾請一位教書先生，將她的「訴可憐」用漢字記述成文；⁶³ 筆者訪問的莫月形老太太（b. 1918），也是請她的孫子將她的「訴可憐」用漢字記錄下來；當然，另有些人的創作則只是停留在口語女歌的階段，例如王剛珍。

這些「訴可憐」的女書歌通常是大家坐著沒事，在門樓吹涼的時候唱。1910年代出生的竹宜便是一例。竹宜結婚當天，還未來得及見上新郎一面，丈夫就被抓去當兵。五年後，公婆去世，夫婿仍音訊全無，竹宜決定返回母家。未料，在返家途中，半路殺出了專程前來「搶新娘」的三兄弟。三兄弟住在鄰村，聽聞竹宜回娘家的消息，便起意劫持竹宜回去給三兄弟中的老大當老婆。此後，竹宜便在「搶親人家」中度過餘生。

「竹宜很會唱，一唱就是幾個小時，甚至整個晚上」、「唱一唱還會停下來解釋」。即便到了文革前後，每到傍晚時分，大家閒坐門樓時，村民就會簇擁著聽她唱歌；「聽她唱歌的有男有女，男的大概都是五、六十歲；女的就老的小的都有」；「竹宜會主動唱自己的身世，唱媳婦對她不好啦，唱自己的兒子有了媳婦就變兩樣……。」跟筆者分享這段回憶的小學老師何耀娟解釋：「竹宜長得很好看，也很講究穿著。守寡時，很多人去騷擾她，所以有很多故事可以唱。」那時候的何耀娟不過六、七歲，年紀太小，無法背誦竹宜所唱的歌，但是對竹宜藉由唱歌所記述的生命經歷，倒是記憶猶新：「老太太邊唱邊哭，聽的人也跟著一起哭咧。」⁶⁴

當然，藉由編唱女歌來公開指責媳婦，不免令媳婦不快，「所以只要媳婦在場，她一般不唱這樣的歌」；兒子在，那就比較沒什麼關係，「因為唱歌是女人的事，做兒子的一般不太管。」易言之，雖說竹宜在唱歌時還是有所忌

63 姜葳，《女性密碼——女書田野調查筆記》（臺北：三民書局，2002），頁132-136。

64 劉斐玟，〈女書和女歌的文化心理情結：從「訴可憐」到「歌功頌德」〉，收入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4），頁299-348。

憚，但仍操控著展演的主導權，她可以依據觀眾的組成，選擇什麼時候唱什麼內容。

但是女書一旦進入學者的研究與出版場域，情勢便不同以往：婦女也許因此得到更多的讀者，但卻失去了原有的掌控權，何靜華就是一例。

何靜華 1939 年出生於允山鄉，24 歲嫁城關鎮蒲家村。何靜華的媽媽是「歌頭」，會唱好多歌：「媽媽和那些老人家喜歡唱『讀紙讀扇』」；「楊家有兩個老太太和媽媽常常一起坐在門口織麻、紡棉，一起唱歌」，「他們有時候在堂屋或廳堂裡唱歌」。何靜華說：「老人家唱一下，日子好過些。」

不過，何靜華的女書啓蒙不是來自母親，而是姨娘。姨娘十七、八歲嫁千家峒，結婚半年後，先生就被「抓兵」。公婆不願養這個媳婦，便以 18 擔穀子的價錢把媳婦賣給一個上江墟鄉葛覃村的寡公當老婆。四、五年後，寡公去世，姨娘再改嫁白水村，並生了一個女兒。遺憾的是，姨娘連這個唯一的女兒也沒養起，所以對何靜華也就特別疼愛，常常接她到白水村小住，一住就是十天半個月。葛覃和白水都是女書重鎮，何靜華便是在這裡接受女書文化的薰陶。

不過「女書」這個詞，何靜華是 1990 年代才第一次聽到，何靜華的母親不識字，「但是她知道這些女書叫『長腳文字』」，「我姨娘那邊也叫這個『長腳文字』。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叫女書」。自小便和女書結下的因緣，激發了何靜華學女書的興致。

何靜華真正開始學女書是在 1996 年前後。「電視高頭不是有那個女書嗎？後來，有一個人買了一本可能是宮哲兵出的，我就拿過來看了一下。我就想，這個女書很有意思的。」後來又有個人給了她剛出版的《江永縣志》。縣志裡有女書，何靜華便以縣志為師，模擬書上所附的女書字表。「我當時也沒有什麼時間，也沒有專心去鑽營這件事，只是拿個小本子，有些字就把它記下來。」

一樁不幸的事件，把何靜華拋向了女書世界。1996 年，才學了女書沒多久，58 歲的何靜華失去了愛子：她當卡車司機的小兒子，在運送貨物往返江永與廣東途中，車禍喪命。晴天霹靂，何靜華哀痛莫名：「我天天哭、天天哭，就更加每個（女書）字都忘掉了。」「我好氣啊」，「我好想兒子啊。想到他……在我們身邊甜言蜜語的『媽，有沒有菜？』一掏就是 100、200 元」；

「『媽，爸爸呢？』『出差去了？』『再想到他的小孩才一歲多。很可憐啊。所以我就一天到晚的哭，睡到半夜也哭。有一次就哭到耳朵像刺一樣的痛，第二天就聽不到了。當時，我老伴還沒退休，跟他的同事提起，同事趕快叫我看醫生，說時間一久就聾了，因為那人的媽媽已經聾了一個耳朵。所以我就馬上去打針。」

聽力算是救回來了，可是喪子之痛如何排解？「因為這個『悲』出不來，這個『痛』出不來，所以我就寫歌，把我的感覺表達出來。」她的第一首女書創作是〈靜華憶兒〉，兒子 1996 年 4 月去世，經過一年多，哀痛依然無法化解，她決定以女書抒發傷痛：⁶⁵

靜華寫書摺扇上 訴我可憐落扇中 一氣爺娘沒世上 二氣命中不如人
三氣前生我沒份 寫在扇中傳四邊

接著，何靜華借用當地「十二月歌」的民歌文體架構，來鋪陳自己的「可憐」：⁶⁶

獨坐房中心不靜 修書訴苦血淚流 正月新年好過日 一家盈盈沒點憂
跨過頭年新正月 家中寒苦水亦甜 二月時來百木發 正是百樹春發時
玉鉢種蘭花一樹 飄到五湖萬里香 三月小兒落陰府 血淚雙流不見天
我兒年剛二十八 誰知年輕早落橋 四月起來轉轉哭 透夜不眠淚雙飄
日夜哭得肝腸斷 幾時養大孫兒身 小兒年輕落陰府 日夜哭愁人不知
他人有爺如珠寶 跟我焦枯真可憐 五月起來轉轉哭 眼淚盡頭不見天
有時抹開眼淚水 看見青天伴白雲 青天白雲風打散 是我煩愁沒開心
誰知前世積了惡 今生今世無路行 兒死陰間二年滿 魂落陰橋漸漸深
.....

十二月年終盡完了 兒在山邊受凄寒 哭聲爺娘哭聲子 日夜哭兒刀割心
心中氣得肝腸斷 透夜不眠到天亮 又想與兒見一面 除非我兒夢裡來
誰知一夜睡不好 一夜不眠夢不成 日間好比夢中過 夜間好像在陰司
時刻想兒雙流淚 眼淚含含氣入心 少時靠夫老靠子 兒在陰橋靠誰人
我的命運真不幸 何年何月得安然

這本〈靜華憶兒〉花了她三個月的時間才完成，「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有

65 本文有關何靜華的口述史與女書創作，係根據筆者 2000、2001、2002、2004、2010 年於湖南省江永縣所進行的田野訪談。

66 例如：採茶十二月歌、寡婦十二月歌、老同十二月歌等。

些字寫不出來，就去翻啊，找啊」。寫好以後，何靜華沒把握自己寫的是對是錯。碰巧對女書頗有精研，也跟胡慈珠學過女書的周碩沂，是何靜華夫家的世交，有一回何靜華送孫子去學校，碰到周碩沂（大家都稱他「周老」），就拿出自己寫的女書說道：「『周老師，你幫我看一下、改一下。』」「以後，我要寫什麼寫不出，就去問他。」

何靜華說：「周老還幫我加了四句話」：「我本來寫的是『心中想兒見一面』，周老把它改成『又想與兒見一面 / 除非我兒夢裡來 / 誰知一夜睡不好 / 一夜不眠夢不成』。」

「我開始寫啊、唱啊，一唱就哭。這裡一些人，聽了我唱的詞語，也哭。」何靜華雖然不是住在農村而是縣城的小巷弄，且 1990 年代中期以後電視也已漸漸普遍，但很多人還是保留飯後在家門口搖扇吹涼的習慣。逢此場景，有些鄰人就會說：「靜華，唱唱歌啦，唱唱你自己編的那些歌。我們喜歡聽。」

然而一篇「訴可憐」如何傾訴得了滿溢的哀思？！於是二個月後（1998 年 5 月）又完成了〈靜華訴可憐〉，「第二首就寫的時間短些，有經驗了。」在這份女書中，她先仿效傳統女書「訴可憐」的開場白：

靜坐房中修書本 訴我可憐傳世間 我是出身寒苦女 不比富家大姑娘
不曾提筆雙流淚 想我可憐訴不完

與第一篇〈靜華憶兒〉相較，不同之處在於除了宣洩喪子之痛外，何靜華並簡介自己的身世：

爺娘所生唯我小 一個姊妹四個兒 我娘亦是命輕女 四個兄弟盡落陰
一兒一花成長大 始得父母的心歡 雖然家中多苦楚 爺娘愛我掌上珠
搭福爺娘多疼惜 送我讀書三四年 年登跨上二十四 爺娘嫁我蒲家門
來到蒲家本是好 一家和氣過光陰 生下兒女有三個 一朵紅花兩個兒
夫君離家幹工作 我帶兒女守家園 省吃儉用操勞苦 才把兒女養成人

婚後，生活迭有起伏，但二子一女總算都成家立業。孰料晴天霹靂：

誰知烏雲頭上蓋 一陣狂風到來臨 烏雲蓋在我頭上 狂風大雨淋我身
莫非前世未行善 給我急曲與憂愁 廣東來電傳悲信 小兒車禍落陰橋
小兒年剛二十八 年紀輕輕離世間 立時哭得肝腸斷 眼淚四垂揩不開
轉轉起來轉轉哭 哭煞世間人不知……夜間不眠五更哭 哭得山動地也搖

不怨天來不怨地 只怨命運好可憐 小兒離娘陰間去 丟下孫兒一歲人
 有爺生來無爺養 行不安來坐不停 走到東邊日頭晒 走到西邊看雨淋
 又想將身自縊死 又氣孫兒離不開 不死在世日難過 去了黃泉誰帶孫
 左思右想不能死 願大孫兒創家園

何靜華爲了喪子日夜啼哭，大兒子和大媳婦看了很不是滋味，便怪罪：「只看得起死了的那個兒子」。何靜華心覺委屈，便在女書中宣洩對大兒子、大兒媳的不滿：

小兒落陰氣不盡 又再雪上更加霜 家中媳娘多言語 言語惡毒入心腸
 利刀割體容易合 言語傷人氣不消 我在青樑屋下坐 媳娘把我不算人
 敲爛碗碟還不算 砸爛屋背無安身 爺病住院兒不看 溫暖言語沒一聲
 養兒不孝日難過 虐待爺娘更傷心 又想苦後有甘甜 爲何我的苦不完
 兒不孝爺不覺得 恐防孫又不孝兒 我的寒苦說不盡 命有萬般的可憐
 ……
 年輕養兒爲防老 兒不孝爺依靠誰 告出四邊齊痛惜 痛惜前生修不全
 心中想起無出氣 自己修書訴可憐

何靜華會寫女書，但女書翻成漢字的部分，都由她口述，再請老伴代筆。寫的既是喪子之痛，又是控訴大兒子不孝，夫妻兩人感同身受，老伴也有話要說，於是自己也加上了幾句話：「爺病住院兒不看 / 溫暖言語沒一聲 / 養兒不孝日難過 / 虐待爺娘更傷心」、「兒不孝爺不覺得 / 恐防孫又不孝兒」。

何靜華雖然用女書宣洩了苦情，卻也不覺有點「心虛」。2000年她在跟筆者討論這份文本時，很焦慮地說：「噯呀，遠藤把這篇拿去了，我就怕她登出來。我忘了交代遠藤了。她（大媳婦）要知道了，她就會天天罵、天天罵。」⁶⁷

何靜華解釋：「我有兩個小兒子，一個給一棟（房子）。對面那棟是給小兒子，這一棟是給大兒子的。她（大媳婦）說她要起屋。我說，那我還沒死，你先不要起屋，不然我們沒有地方住。結果，她連我老伴都打」，「還罵我那個老伴叫『老打靶鬼』、『老絕根頭』（絕人種）」。「我兒子啊，那也太糗

67 筆者事隔十多年才發表何靜華的女書創作，也是考量於此。現因何靜華日漸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且被提升爲國家級女書傳人，每月有 5000 元人民幣的政府津貼，孫子又已成年，她自己也把「訴可憐」的女書寫成手抄本公開販售，顯見當初的顧慮當已不復存。

了。也跟她一樣，都不管我們……，還當外人的面說：不養我們……，要餓死我們。」何靜華很感慨：「我媳婦的心太惡；我兒子的心太糲。兒子他還罵我斷子絕孫。」或許大兒子是以這種方式來抒發自己的怨氣吧：他生的是女兒，而小兒子生的則是崽，有了重男輕女的心理情結，總覺得何靜華偏疼去世的小兒子。何靜華感嘆：「我那個（大）兒子就在上江墟煙草公司，他一回來，就把我的東西砸爛。所以，他在家裡，我東西（女書）都不敢拿出來。」

雖然寫了女書，但卻不敢公開唱誦流傳的不僅何靜華一人，義年華也有同樣的隱情。義年華的自傳長達三千多字，在這篇訴可憐中，義年華以唱本的起手式開場，似乎藉此隱喻她波折的人生：⁶⁸

不唱前王並後漢 聽唱年華姓義人 要知年華出身處 一二從頭聽端詳
家住湖南永州府 永明縣內有家門 東門出城二十里 地名叫做棠下村

接著，義年華陳述自己隨母親回娘家守寡、14歲返回祖父家、17歲出嫁等情事。婚後，夫妻關係雖然和樂，但婆婆甚為苛刻：

年華年剛十七歲 郎公交全桐口村 配與盧全為夫主 初到盧家並無煩
來到三年上四載 養起女兒是一個 我夫出鄉書房去 誰知母親說枉言
枉我暗中煮蛋吃 哪個神仙來證明 日間與娘同陪坐 夜間同被又同床
年華盡心待父母 哪有此心偏別娘 老娘當天來跪下 咬土三口咒台身

義年華的兒子三歲早夭，婆婆也怪罪她帶剋：

我兒養了三歲滿 口內起疔心亂溶 錢銀整了幾百塊 人財兩空沒功勞
想起老娘心腸毒 咬土三口咒台身 咒台將身沒好處 咒了三年崽落陰

更不幸的是，義年華也步上母親的後塵，年紀不到三十便守寡：

頭年我兒落陰府 第二年間夫落朝 得知前世積了惡 無兒無夫靠誰人
清朝起來哭到黑 哭子哭夫過時辰 日間確如夢中過 夜間確如在陰司

在守寡期間，義年華且帶著兩個幼女經歷「走日本」的逃難歲月。1949年後，很多傳統禁忌不再嚴格執行（例如：同村不婚），爲了彌補無子之憾，義年華決定爲二女兒招贅，只是女兒招了夫婿之後，嫌母親給的嫁妝太少，所以還是搬到夫家去住；1950年代末期，大躍進政策失利，農村食物缺乏，

68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77-292。

很多家庭爲了照養幼兒，只好犧牲老年人的福利。義年華的女兒就嫌母親「年老無用人」。承受不了女兒的臉色，年逾 50 的義年華只能老著臉皮改嫁他人。⁶⁹

沒想到改嫁不滿一年，丈夫又因病去世，二個前頭仔對義年華很不諒解，認爲她招來厄運，義年華受不了閒言閒語，再度改嫁。義年華的第三段婚姻維持了 20 年後，三度喪偶。當時義年華方被學者奉爲上賓，在有利可圖的誘惑下，同時亦唯恐母親的女書資源被自己的姊姊搶去，二女兒於 1984 年將三度守寡的義年華接回桐口老家同住，但沒多久，女兒和女婿又說出無情話：

望我投河自縊死 大河沒蓋好終身 女兒本是心腸毒 幾母⁷⁰商量趕我身
罵台回家來享福 不自思量哪樣人 又說我是沒得病 故意做出病樣形

在這篇訴可憐的結尾，義年華不禁感嘆：「親生女兒趕出我 / 如今何處是我家」。

小女兒對義年華非常苛刻，不但惡言相向，還不准母親去探望住在鄰村的大女兒。⁷¹ 義年華晚景淒涼，凡事都得自食其力，宮哲兵描述道：「(她)住在又窄又髒的房子裡，自己單獨開伙做飯」，且飽受哮喘之苦，可謂貧病交加。⁷² 當時，適逢女書研究熱潮，義年華便以販售女書貼補家用。女書學者趙麗明告知筆者：義年華每寫一篇女書，下面必然用複寫紙複印好幾份，再一份 20 元賣給學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寫過數十篇的女書，唯有一件作品絕不販售，那就是她的女書自傳。一方面是因爲「每天還在添加修改」，另一方面則是擔憂出版的後遺症。曾數度前往江永進行女書田野考察的姜蕺指出，他後來（1990）是以十元的價錢，才跟義年華借到原稿來抄寫。⁷³ 但

69 女書傳人何豔新的外婆也是在大躍進政策失利後，因食物不足，而受媳婦虐待。外婆且一度上吊。自殺獲救後，以 85 歲的高齡改嫁，改嫁不及一年便病逝。豔新說：「外婆改嫁，那是賭氣啊；這麼老還改嫁，還不如在家裡餓死。」請參考 Fei-wen Liu, *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p. 90.

70 「幾母」：母親和子女。

71 義年華的大女兒告知筆者，她母親得先繞道到浦尾村，吃了中飯才敢來她這裡（新宅村）。

72 宮哲兵，《女性文字與女性社會》（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頁 214。

73 引自姜蕺，《女性密碼——女書田野調查筆記》，頁 90。

1988、1989 就跟著義年華學女書的美國學者 Silber 卻指出：義年華當時並不願意把自己的訴苦自傳借給她抄印，她擔心 Silber 會把這則女書發表在報紙上，而女兒一旦得知她在「訴可憐」中控訴其不孝，她這個老母親必然要為此付出「代價」。Silber 還指出，有一篇女書「訴可憐」的當事人和 Silber 住屋的主人有所牽連，而訴苦的事件又有些爭議性，義年華唯恐這則女書給當事人帶來不必要的糾葛，所以也堅持這首女書作品只能在義年華的住處讀誦。⁷⁴ 義年華所寫的「訴可憐」大多會標誌主人翁的名字，但〈二十八歲守寡媳婦不孝〉卻是例外，或許也是基於同樣的考量。〈谷母溪唐舉仙〉一文的結尾提到：「將身就世容易事 / 又要與子遮面皮」。當事人顯然有苦難言，只能「吃盡生薑受盡辣 / 吃盡胡椒辣盡心」，一切自己承受。

同樣是 1980 年代學者所仰賴的女書老太太高銀仙也有類似的困擾。高銀仙寫過三篇自訴可憐的女書，其中一篇只有短短六句：⁷⁵

金雞高啼聲送遠 只是得名又得聲 我是出身姓高女 落處姓胡浦尾村
年剛今年八十八 留起世間無用人

另一篇是惋惜家族男丁薄弱，「只氣台身單薄了 / 爺亦一兒子一個 / 孫亦一個單薄了」。⁷⁶ 第三篇則是抱怨兒子不孝，但也只能委婉點出：⁷⁷

唯台老人是無用 在於世間真可憐……台想將身無出氣 養起金佗一個兒
不比三兄是四弟 得台將身沒憂愁 千般可憐在心氣 不敢高聲說分明
一日三餐檯頭坐 不算台身一個人 叫出四邊說知聽 千般煩言人不知
想起台身無出氣 透夜不眠如刀割 眼淚四垂到天光 只想老了是無用
千般可憐在心理 不給四邊人取笑

「不敢高聲說分明」道出訴可憐作為婦女論述「有所不能言」的苦衷。而這一苦衷正是因為出版介入了女書的論述場域。

女書「訴可憐」在傳統的江永社會，係以民間唱誦的方式傳播，特別是在茶餘飯後，聚會吹涼的場合。對「訴可憐」的主體而言（不論是自己創作，找槍手代寫，或是請他人代筆），編寫「訴可憐」的欲求與創作本身，既

74 Silber, *Nii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p. 190-191.

75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72。

76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71。

77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中國女書集成》，頁 273-274。

是一種自我反思，也是尋求知音，並從中探索苦難經歷的意義與過程。而在編唱「訴可憐」的同時，她們心中也有預期的聆聽者或讀者；她們預期聆聽者可以藉由聽唱她們的「訴可憐」，進入她們曾經歷過的苦難世界，瞭解她們如何一度為苦難所縛，爾後又破繭而出的艱辛、堅毅與韌性，在苦難中體會敬天（「望天保佑」、「上天惜」、「上天疼」）、認識到命運的不可逆（「前生修不全」）、人事的無常與滄海浮沈。對聆聽者而言，這也是一種擴展生命向度的歷程，在閱讀他人的苦難經歷中，觀照自身的生命情境，或是身為人女之憾，或是屈從於「三從」之無奈，更是感恩於對自己有過援手的人與事，大從政治領導毛主席，小至日常周遭的郎叔伯娘。如若在「訴可憐」中，針對某人、某事有所批評或指控，「訴可憐」的主人翁也可依聽眾組成決定唱與不唱，乃至唱誦的內容。且基於男女有別，即便婦女在「訴可憐」中批評兒子的不是，他也只能像竹宜的兒子一樣佯裝不知，畢竟「唱歌是女人的事」。

但學者介入女書的場域之後，「訴可憐」的掌控權易位。一方面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學者常須仰賴女書老太太的家人協助解讀文本意涵，特別是男性親屬（男性在家中較有發言權，且教育程度較高，易與學者溝通），這使得有些老太太在訴怨的時候，不得不有些顧忌。另一方面，就算在研究過程中，學者可以獨立作業，無需求助於女書老太太的家人，然一旦所蒐集的女書作品出版，這些在女書中被「控訴」的對象，將何以自處？他們難保不會將怨氣反加諸於編寫「訴可憐」的苦主身上。有時候，所控訴的不是個人，而是時代，那麼置身其中的關係人是否會覺難堪？1930年出生的義紹璋就曾告訴筆者：女書學者來訪的時候，曾錄了她所編唱的「訴可憐」，但「我沒有全部唱」，她擔心她的「訴可憐」一旦在電視上播映，那麼「老何（她丈夫）會『沒有面子』。」因為她這首女書歌所傾訴的可憐情境之一，就是老何在1960年代因政治陷害而入監，致使她必須獨自撫養一子一女的苦情。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二十一世紀，女書的論述型態會逐漸由「訴可憐」轉變為「歌功頌德」，何靜華就是最好的例證。從2001年起，她鮮少創作「訴可憐」，而是改走歌功頌德的路線。2002年，她且寫下歌頌當權者這種女書前所未見的政治題材，如〈頌祖國〉：⁷⁸

78 2002年10月21日湖南省江永縣田野訪談。

喜看神州大地紅爛漫 祖國河山美麗多嬌嬌
 歡慶建國五十三週年 祖國各項建設大發展
 農業增產豐收傳喜訊 工業科技創新捷報傳
 改革開放政策結碩果 國泰民安生活奔小康
 黨的三個代表指航向 欣觀祖國繁榮更昌盛

或是〈祝賀黨生日〉：

祝賀七月一日共產黨生日 祖國各地到處一片歡歌聲
 儂婦女愧無禮品敬獻給黨 寫篇女書文字獻給黨生日
 女書字字都是儂的情和意 女書句句表達儂的愛黨心

的確，過去十年來，除何豔新外，其他老一輩和新一代的女書傳人幾乎不再創作「訴可憐」，而是爭相以女書來抄寫唐詩、宋詞，或吉祥如意之類的祝賀詞語，並在「女書園」中販賣這些作品。如此，既滿足遊客對女書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婦女文字」的歷史想像，自身又能從中博取承傳女書文化的聲名。對她們而言，女書不再是記錄婦女生命情事的工具，而是一種歌頌「大傳統」的「小傳統」。於是乎，女書不再是「女」書，而僅僅是女「書」。

四、結 語

女書「訴可憐」的傳記體可說是以婦女為「史官」，所書寫而成的婦女生命史。從中，我們讀到向來由男性執筆的史書甚少觸及的題材，像是童養媳以及身為女人的無力感；此外，我們也看到婦女的關懷與男性或有差異。譬如，婆媳之間衝突與權力不平衡的現實層面，往往是女書「訴可憐」的重要題材；有趣的是，同樣是女書，如果來源是翻譯自男性文人所書寫的唱本故事，那麼它所呈現的便是婆媳關係的理想面：即便家庭經濟面臨困境，媳婦也竭力勤苦持家，侍奉婆婆。

如果透過跨文體的分析比較，我們更可看到男女視事觀點之別，守節與再嫁就是箇中最堪玩味的議題。⁷⁹ 江永的地方志記載：「閩範嚴

79 有關江永婦女的守節與再嫁，請參考 Fei-wen Liu,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Fidelity and Fertility: *Nüshu*, *Nüge* and Peasant Women's Conceptions of Widowhood in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4(2001.11): 1051-1084.

肅，不善豔妝，重名節，夫故不再嫁。單門筆戶，多以苦節且貞者」，⁸⁰但在女書「訴可憐」中，寡婦改嫁卻比比皆是，一嫁、二嫁，甚至三嫁。而女書與地方志在論述上有所差異，主要在於主體性（subjectivity）的不同所致。地方志是以夫家為主體。從夫家的角度觀之，婦女在三從的規範下，僅僅是丈夫角色的延伸，其任務便是代理丈夫執行其未竟之業，上事父母（公婆）、下輔遺孤；若有必要，勸說公公納妾，以繁衍後嗣，也是婦女美德的表現。⁸¹

但對江永農婦而言，建構她主體的根基既不是丈夫，也不是代表宗族的子嗣，而是涵蓋子與女的人母角色。子女既是人母的職責所繫，更是婦女情感的依託。所以婦女一旦無兒無女，多半走上改嫁一途。從儒家男性威權的家族角度來看，貞節與後嗣乃維繫家族賡續的核心價值；但對寡婦而言，這兩個核心價值卻隱含矛盾：在嚴禁婚外情的前提下，無嗣寡婦想要養兒防老的唯一出路，就是再嫁。可是一旦再嫁，婦女貞節何以保全？而在女書所呈現的便是一個妥協後的觀點：改嫁無損於女德，只要能將子女成功撫養成成人，承繼家嗣，就是「苦守成家出功勞」。至於能否「苦守成家」，牽涉的不僅是個人意志，更賴其他「配套」因素：婦女所面臨的經濟壓力、娘家的依怙、夫家的扶持等。俗諺有云：「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可是江永婦女回娘家守寡的情形並不少見，端視娘家的經濟實力而定，義年華的母親即是一例。

如果將分析層面推及至宏觀的社會場景，那麼不論是改嫁抑或守寡，是因失怙而淪為童養媳，抑或因不孕、無子與經濟壓力所產生緊張的婆媳關係，乃至婆媳權力關係的易位，這些又莫不與時代變局相互牽引。戰爭頻繁導致的逃難與抽兵、土地改革帶給弱勢農民新希望，新婚姻法賦予婦女離婚的權力，但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又引發糧食危機，徹底地考驗人性的脆弱與不堪。這些都在女書中一覽無遺。

中國小農經濟體制下的氏族結構與三從規範，一方面是婦女生活的砥石，一方面也左右婦女命運，乃至她們的自我定位。也所以婦女在「訴可憐」時，所訴的不僅是一己之可憐，而是譜系概念下家族成員之可憐；可憐

80 清·王春藻修，劉圭、李文耀纂，《永明縣志》（出版項不詳，1846），卷3，頁5。

81 清·王春藻修，劉圭、李文耀纂，《永明縣志》，卷11，頁11。

也不僅是個人苦情的宣洩，更是一種對周遭人事的關懷之情，或為他人的苦情抱不平，或以自己的苦情來贏取他人的疼惜，並以此提升自尊。或許，正因婦女「依從」的身分與命運，她們更能珍惜患難中伸出援手的真情。於是，女書在「訴可憐」之餘，也是一種抒發感恩情懷的論述，或謝天、或謝人。此外，在「訴可憐」的同時，也可能帶有申訴冤曲的味道，同時也為了消彌自己的罪惡感：如王轉初的媳婦喝農藥自盡，義年華的妹夫為了幫自己取衣物，差點命喪日軍之手等。

女書既是「訴可憐」，自然有所怨懟。所怨者，是自己身為女人的無奈與不孝：「如今我身錯度女 / 長大成人別娘恩」；在怨懟中，也是對「出鄉」這一社會體制的抗議。但抗議，又不時撤回到認命的堡壘中，只怪「前世積了惡」，乃至今世受苦辛。所怨懟者，也可能是人事：或是「父母心粗分開台」、「管起不准讀文章」、「咒台將身無好處」，或是「他家拋娘看不起」、「算我奴婢一般形」、「不給崽來送上崗」、「拆散鴛鴦兩路行」；或是前頭仔「圖財害命挖眼睛」；或是丈夫「將我拋在賭錢檯」；或是「婦娘分開台 / 分開獨家冷冰冰」、「言語惡毒入心腸」、「開言叫我改步行」；或是「只是我兒沒才事 / 娶得婦娘變了心」；甚至女兒女婿「望我投河自縊死 / 大河沒蓋好終身」。

從女書傳統的唱誦活動與型態來看，這些怨懟透過小團體的公開唱讀，對當事人而言，不平之鳴得到了抒發與開解；對聆聽者而言，在閱讀他人的生活經歷中，觀照自身的生命感知，「同理心」於焉而生（也就是女書所經常提及的「疼惜聲」）；⁸² 最重要的是，當事人握有「唱與不唱」的掌控權，她可以依聆聽者的屬性，適當地調整她所傳唱的內容。但是女書一旦進入學者的研究與出版場域，女書和女歌的唱誦文化一單被化約為單純的書寫形式，女書和女歌的展演一單失去了它作為聯繫「情感共同體」（a community of sentiment）的社群基礎，⁸³ 那麼同理心的建構不免產生斷裂。蓋閱聽人和「訴可憐」的當事人可能分屬不同的社會群體，閱讀對他們而言，與其說是一種

82 Fei-wen Liu, "From Being to Becoming: *Nüshu* and Sentiments in a Chinese Rural Commun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31.3(2004): 422-439.

83 Arjun Appadurai, "Topographies of the Self: Praise and Emotion in Hindu India," in Catherine A. Lutz and Lila Abu-Lughod, eds.,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4.

情感的擬入過程，毋寧說女書訴可憐的主體變成了被「凝視」(gazed)，又帶點奇風異俗(exotic)的客體；更有甚者，也是「訴可憐」的編唱人所最為擔憂的，那就是女書所批判的對象成了女書的讀者，如是，她們將何以自處？

而這正是女書在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弔詭：學者的出版使得江永婦女的情意音聲，得以藉由女書更廣泛地為大眾所知悉，甚至幫助我們瞭解農村婦女的民間觀點，彌補正史之不足。但當女書由民間「小眾」，擴展為出版的「大眾」時，女書「訴可憐」的當事人也因之失去了文本的掌控權，對於使用女書這一發聲管道，也因之有所忌憚。於是乎，即便有「訴可憐」的文化傳統在手，即便有女書可為史筆，她們最後反倒緘默了。出版究竟是婦女音聲的傳聲筒，還是消音器？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譚惟一修，蔣士昌纂，《永明縣志》，康熙永明縣志十三卷，1667
 清·周鶴修，王纘纂，《永明縣志》，康熙永明縣志十四卷，1709。
 清·王春藻修，劉圭、李文耀纂，《永明縣志》，道光永明縣志十三卷，1846。
 清·萬發元修，周銑詒纂，《永明縣志》，光緒永明縣志五十一卷，1907。

二、近人論著

- 史金波、白濱、趙麗明主編 1995 《奇特的女書——全國女書學術考察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李恩軍、徐釗 2003 〈女書文字與太平天國〉，收入宮哲兵主編，《搶救世界文化遺產——女書》，湖南：時代文藝出版社，頁 224-231。
 李慶福 2009 《女書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慶福 2010 《永州女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周碩沂 1959 《江永縣解放十年志》，江永文化館油印稿。
 周碩沂 2002 《女書字典》，長沙：岳麓書社。
 姜 葳 2002 《女性密碼——女書田野調查筆記》，臺北：三民書局。
 唐功暉 1995 〈上江墟的婦女文字〉，收入史金波、白濱、趙麗明主編，《奇特的女書——全國女書學術考察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頁 37-52。

- 唐功暉、宮哲兵 2007 《女書通》，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宮哲兵 1991 〈導論：解讀女性文字的秘密〉，收入宮哲兵主編，高銀仙、義年華原作，《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頁 15-57，臺北：婦女新知出版社。
- 宮哲兵 1995 《女性文字與女性社會》，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宮哲兵 2001 〈江永女書是清代的文字〉，《尋根》2(2001.4): 19-25。
- 宮哲兵主編，高銀仙、義年華原作 1991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臺北：婦女新知出版社。
- 陳其光 1993 〈女字與漢字〉，《漢學研究》11.2(1993.12): 251-258。
- 陳其光 1995 〈女字的產生和性質〉，收入史金波、白濱、趙麗明主編，《奇特的女書——全國女書學術考察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頁 113-124。
- 陳其光 2006 《女漢字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 曾繼梧編 1931 《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上冊，湖南：和濟印刷公司。
- 楊仁里、陳其光、周碩沂編譯 1995 《永明女書》，長沙：岳麓書社。
- 趙麗明 1995 《女書與女書文化》，北京：新華出版社。
- 趙麗明 1999 〈漢字在傳播中的變異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1: 47-54。
- 趙麗明主編 2004 《陽煥宜女書作品集》，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趙麗明 2005 《中國女書合集》五冊，北京：中華書局。
-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注，陳其光校訂 1992 《中國女書集成——一種奇特的女性文字資料總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趙麗明等 2006 《女書用字字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 湖南省江永縣縣志辦公室編 1995 《江永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日)遠藤織枝 1996 《中国の女文字——伝承する中国女性たち》，東京：三一書坊。
- (日)遠藤織枝 2002 《中国女文字研究》，東京：明治書院。
- (日)遠藤織枝 2003 〈關於女書歷史的幾個問題〉，收入宮哲兵主編，《搶救世界文化遺產——女書》，湖南：時代文藝出版社，頁 117-126。
- 劉斐玟 2003 〈書寫與歌詠的交織：女書、女歌，與湖南江永婦女的雙重視維〉，《臺灣人類學刊》1.1(2003.6): 1-49。
- 劉斐玟 2005 〈文本與文境的對話：女書三朝書與婦女的情意音聲〉，《臺灣人類學刊》3.1(2005.6): 87-142。
- 劉斐玟 2007 〈開顯 Geertz 的深描闡微：女書文本的敘說、閱讀與展演〉，《臺灣人

類學刊》5.1(2007.6): 63-107。

劉斐玟 2010 〈情義、性別與階級的再現與超越：梁祝敘說與文體之音〉，《戲曲研究》5: 27-68。

劉斐玟 2012 〈文化與歷史的透視鏡：中國農村婦女呼新奎的生命史敘說〉，《臺灣人類學刊》10.2(2012.12): 139-195。

劉斐玟 2014 〈女書和女歌的文化心理情結：從「訴可憐」到「歌功頌德」〉，收入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299-348。

謝志民編 1991 《江永女書之謎》三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謝志民 1991 〈女書之源不在楷書〉，《中南民族學院學報》48(1991): 98-206。

謝志民 1991 〈女書是一種與甲骨文有密切關係的商代古文字的決疑和演變〉，《中南民族學院學報》51(1991): 59-65、73。

謝志民 1991 〈女書詞彙中的百越語底層〉，《民族語文》2(1991): 62-70。

謝志民、謝燮 2009 《中國女字字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羅婉儀 2003 《一冊女書筆記》，香港：新婦女協進會。

Appadurai, Arjun. 1990. "Topographies of the Self: Praise and Emotion in Hindu India." In Catherine A. Lutz and Lila Abu-Lughod, eds.,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2-112.

Chiang, William (姜蕙). 1995. *We Two Know the Script: We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Idema, Wilt L. 1999. "Changben Texts in the *Nüshu* Repertoire of Southern Hunan." In Vibeke Bordahl, ed., *The Eternal Storyteller Oral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pp. 95-114.

Idema, Wilt L. 2009. *Heroines of Jiangyong: Chinese Narrative Ballads in Women's Scrip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Liu, Fei-wen (劉斐玟). 2001.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Fidelity and Fertility: *Nüshu*, *Nüge* and Peasant Women's Conceptions of Widowhood in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4: 1051-1084.

Liu, Fei-wen (劉斐玟). 2004. "From Being to Becoming: *Nüshu* and Sentiments in a Chinese Rural Commun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31.3: 422-439.

Liu, Fei-wen (劉斐玟). 2004. "Literacy, Gender, and Class: *Nüshu* and Sisterhood Communities in Southern Rural Hunan."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6.2: 241-282.

- Liu, Fei-wen (劉斐玟). 2010. "Narrative, Genre, and Contextuality: The *Nüshu*-Transcribed Liang-Zhu Ballad in Rural South China." *Asian Ethnology* 69.2(2010.10): 241-264.
- Liu, Fei-wen (劉斐玟). 2012. "Expressive Depths: Dialogic Performance of Bridal Lamentation in Rural South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5(496): 204-225.
- Liu, Fei-wen (劉斐玟). 2015. *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aren, Anne. 1996. "Women's Voices and Textuality: Chastity and Abduction in Chinese *Nüshu* Writing." *Modern China* 22.4(1996.10): 382-416.
- Silber, Cathy. 1994. "From Daughter to Daughter-in-law in the Women's Script of Southern Hunan." In Christina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47-69.
- Silber, Cathy. 1995. *Nü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Visweswaran, Kamala. 1997.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om Writing to Publication: *Nüshu* Biography's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nd Its Contemporary Dilemma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Liu Fei-wen*

Abstract

Nüshu 女書, literally “women’s writing,” is a script developed by and circulated exclusively among women in Jiangyong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in south China. Referring to both the script and the literature written in it, *nüshu* is the only writing system known thus far that is female-specific, a script that men cannot read or understand. By using *nüshu*, Jiangyong women, mostly illiterate in official Chinese characters, construct sisterhood networks, write wedding missives, and compose narrative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situations, comment on certain incidents, or even solicit support from the divine realm. Although *nüshu* writings vary in subject matter, all carry a biographical tinge known as *su kelian* 訴可憐, or “lamenting one’s misery.” Since *nüshu* became a part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agenda in the 1980s just as its use nearly faded away, its generic sentiment, *su kelian*, has undergone a change. Approached from textual and practice analys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nüshu* biographical writing’s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nd its contemporary dilemma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I illustrate how *su kelian* as *nüshu*’s generic sentiment speaks to women’s multiple perspectives, perspectives that may be obscured in, or even contradict with, the mainstream male-written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

* Liu Fei-wen is a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the Academia Sinica.

demonstrate how scholarly research, especially publication, has shaped a new poetics of *nüshu*: while salvaging the endangering tradition, it has confined, if not redefined,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nüshu*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nüshu* (women's writing), biography, lamenting one's misery, writing, practice, publication